

如何理解帝国主义的垂死性

洪文达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按照经济实质,“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①它说明,帝国主义是资本关系社会化的最高阶段,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矛盾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过渡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时代必然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

政治经济学中以三大矛盾尖锐化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垂死性的流行观点,是不恰当的。首先,三大矛盾本身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是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而垂死性则是帝国主义的重要属性。上述解释方法有把经济和政治关系倒置的倾向。其次,垂死性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性质的规定,是和帝国主义同始同终的,以三大矛盾达到极端,接着爆发革命来说明垂死性,这就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三大矛盾未达到极端的时期,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就不存在。再次,这种解释把垂死性的经济内涵和由它决定的世界范围的政治斗争混同了。直接从三大矛盾分析资本主义走向死亡,是跨越了基本矛盾和垂死性这一层次,无助于从根本上说清问题。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的理论中,始终是把垂死性和过渡性等同看待的。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过渡性,是指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占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社会化。总的说来已发展到顶,余地已很小,而生产力和管理机构的发展已为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物质准备。

列宁是把“垂死的资本主义”和“过渡的资本主义”的提法等同的,但他为什么认为垂死比过渡的提法“更确切”些呢?很可能是,他在当时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估计到帝国主义快要死亡了,认为帝国主义这个过渡性阶段不是很长的。我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死亡期作了乐观的估计。主要是因为:(一)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

高阶段》等著作时,正值帝国主义国家大战方殷之时,大战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性,造成了“‘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②的局面,激起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义愤,革命形势已经高涨。列宁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帝国主义统治即将被推翻,世界革命可能很快胜利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在二十世纪初期,对技术如此规模的发展,也是很难准确估计到的。(三)列宁当时已看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那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适应战争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管制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是和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实际工资、使工人服军事苦役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德国)。它和二次大战后形成体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内容和措施上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那时也很难设想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缓和矛盾、促进经济发展的这一方面的作用。

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时,是认为过渡期不会很长的,因此,才说“垂死的”这个词比“过渡的”更确切。但这一切都无损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光辉思想。

(石边摘自《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帝国主义腐朽性和垂死性的若干问题》)

国际支付危机和债务危机

陈彪如

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收支结构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全球性的收支不平衡。在这期间,经历了两个周期。原来是工业国家顺差,发展中国家逆差。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提价后,石油输出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猛增约10倍,达683亿美元;工业国家从顺差转为逆差,计110亿美元;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逆差扩大3倍,总额为371亿美元。但到1978年,石油输出国的顺差几乎消失了,工业国家又有了337亿美元的顺差,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逆差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4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39页。

却增加到411亿美元。这是第一个周期。从1978年到1980年,石油再次提价后,石油输出国的盈余从22亿美元增至1,143亿美元,工业国家再度发生逆差,达406亿美元,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逆差增加1倍,达889亿美元。从1980年到1982年,石油输出国的顺差下降到10亿美元,工业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一般都得到加强,但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逆差却达到900亿美元。这是第二周期。

从上述两个周期里,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支付模式的变化:(1)发达国家顺差,发展中国家逆差;(2)石油输出国顺差,非石油生产国逆差;(3)发达国家顺差,非产油发展中国家逆差扩大。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有时是盈余,有时是赤字,而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却是赤字不断增加(1979—1982年的4年期间,逆差总额达3,432亿美元),于是国际收支的赤字和盈余变成全球性的问题,不仅直接威胁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从今后发展趋势看,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逆差有可能缩小(1983年将减至700亿美元)这是因为:(1)石油价格稳定,世界原料价格已趋上升;(2)工业国家通货膨胀下降,世界经济开始复苏;(3)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收到一定效果。但各国情况不同,一些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逆差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国际支付危机仍将存在。但国际支付的困难,主要不在于数额的大小,而在于调节的机制。所以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改善国际收支调节的机制,否则国际支付危机将愈演愈烈,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更令人不安。

国际支付危机是与债务危机交织在一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从1971年的870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5,250亿美元,每年平均增长20%。据估计,到1984年底,第三世界的中、长期债务将达6,370亿美元,短期债务达1,000亿美元。庞大的国际债务在威胁着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

当前债务问题是异常严重的,但在短期内不致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银行和各国政府通过多边谈判,采取协调行动,仍有足够的力量防止一场金融灾难。今后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是否会成为对世界经济的一个严重威胁,一方面取决于世界金融体系的效率与灵活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调整经济、增加出口的结果。

果。关键性的问题是,工业国家应取消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离开世界贸易的发展,国际债务可能变成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石边摘自《国际金融》1984年第3期《谈谈国际金融形势》)

过剩人口是普遍规律吗?

刘长茂

《试论马克思的过剩人口增长规律》^①的基本观点是: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它们之间在运动过程中必然出现相互适应和相互矛盾,“过剩人口就是在两种生产的矛盾发展中产生的。”其结论是“马克思的过剩人口增长规律是普遍地适用于各社会形态的。”

过剩人口是普遍的人口规律吗?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谈到了几个社会的过剩人口现象,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5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定论时,并没有作出过剩人口是一切社会共有规律的结论,恰恰相反,他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这一结论成了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在过剩人口问题上的分水岭。并不是有过剩人口的社会,它(指过剩人口一编者)都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人口规律。问题的关键在于,过剩人口与这个社会制度是否有本质的联系。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揭示并论证了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

过剩人口,是指没有就业的劳动人口。马克思说:“‘过剩人口’这个用语只同劳动能力有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过剩人口只同劳动人口与没有相应的就业手段有关,而与全体人口同生活资料的多少无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现在存在着过剩人口。主要表现是,城镇进入劳动年龄的青年,不能及时全部就业,即存在着待业青年;城乡又出现了相当多的过剩就业,即两个人能干的话由三个人干。过剩人口和过剩就业从能否充分利用劳动资源

^① 参阅程度、王冰著《学习马克思关于过剩人口增长规律的论述——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编者)。